

近代中国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互动关系的研究回顾与前瞻*

刘家峰

内容提要：最近20多年海内外学者针对近代中国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互动关系问题发表了不少论著。本文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回顾，讨论了基督教传教学、伊斯兰教护教学、文明（宗教）对话、文化交涉等多重视角参与研究的必要性，强调全球史观对理解近代中国这两大宗教关系的重要性。

关键词：基督教 伊斯兰教 近代中国 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刘家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海外学术界很早就开始研究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欧亚大陆的相遇、冲突与对话，现在已硕果累累。荷兰Brill出版社最近的一套《基督教伊斯兰教关系的历史：文本与研究》（*A History of Christian-Muslims Relations, Texts and Studies*）丛书，从2003年到2010年已出版14卷。这些著作注重原始文献的整理和翻译，以专题研究为主。综合性著作有《基督徒穆斯林关系史》、《理解基督教与穆斯林关系：过去与现在》、《20世纪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对话》等。^①从1990年起，Routledge出版集团开始编辑季刊《伊斯兰和基督徒-穆斯林关系》（*Islam and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专刊此专题的研究论文。上述西方作品研究重点一般放在了欧洲和穆斯林世界。近20多年来汉学家对有关中国学（汉学）的研究十分关注，发表了不少文章。国内近10年也有学者关注，他们的论著数量不算多，但质量不容小视。本文拟对这一课题已有的研究论著加以梳理，并对该课题研究的某些视角和方法予以分析，以期推动中国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互动关系的研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的“近代”和“基督教”主要是指1807年以来入华的基督新教，并不包括天主教，因为就目前资料来看，近代来华天主教对伊斯兰教并无特别的战略性传教计划，但文中也涉及个别明末清初的天主教文献。

一、有关近代中国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互动关系的研究综述

国外研究起步要比国内早一些。1987年，希伯来大学在耶路撒冷举办了一个“本地人对传教的反应研究国际工作坊”，内容之一是中国穆斯林对基督教传教的反应。该项目由以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历史见长的拉斐尔·以色列利（Raphael Israeli）主持。^②他在1995年发表了《十字架与新月的战争：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中国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相遇与对话”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09JJJD73001。

① Hugh Goddard, *A History of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Clinton Bennett, *Understanding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08; Atallah Siddiqui, *Christian-Muslim Dialogu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② 其代表作有 *Muslims in China: A Study in Cultural Confrontation*, London and Malmo: Curzon Press, 1980; *Islam in China: A Critical Bibliography*,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94.

传教士在中国穆斯林中工作的一个世纪》，综合了这次工作坊的成果。^①这是第一篇对中国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互动关系的综合研究。作者考察了1850—1950年间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穆斯林中传播福音的历史，评述了传教的各种方法以及穆斯林的回应。作者认为中国穆斯林对基督教传教士的响应，在对福音的“接受”和“拒绝”之间呈现出多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他发现，穆斯林群体中，中国化的穆斯林比纯粹的穆斯林更容易接受基督教；少数派的比多数派的更容易保持信仰；城里的比乡村的更善于与传教士打交道；贫寒的文盲比有文化的、富裕的更容易受到传教士的影响。以色列利还揭示了传教士对中国穆斯林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他们一方面认为中国穆斯林是易接近的，另一方面却说他们是难以对付的“敌人”，既害怕又羡慕。基督教虽然在中国很多穆斯林地区传教，但没能在一个地方扎根，从传教的视角看，他们的工作是完全失败的。该文结论认为，基督教与穆斯林的互动显然不是固定的，也不是从基督教向伊斯兰教单向进行的，二者是辩证的关系：它们相互提出挑战并响应，直面彼此，两者的盛衰沉浮取决于它们在中国的命运。这篇文章充分利用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各种出版物，叙述全面，立论扎实，成为今后研究这一课题的基石。

法国蒙古学专家鄂法兰（Francoise Aubin）在研究中国伊斯兰教时，特别留意基督教在西北穆斯林地区的传教工作，发表了《新教传教士与中国穆斯林》^②。该文主要利用《穆斯林世界》（Moslem World）、《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和内地会机关刊物《中国大众》（China's Millions）等期刊，概述了内地会在这些地区的活动。美国学者柯饶福（Ralph R. Covell）在1995年出版的《解放福音在中国：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基督教信仰》，也有两章描述传教士在中国穆斯林地区的传教情况。^③

20世纪90年代，国内也有学者从边疆研究的视角关注这一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中心房建昌在1994年发表了《近代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西北少数民族中的传教活动及有关文献概述——兼论近代西方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穆斯林中的传教活动及有关文献》，^④介绍了在中国西北穆斯林中工作的几位重要传教士，如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博德恩（William Borden）、安献令（Andrew George Findley）、濮马克（Botham Mark）、知味墨（Samuel M. Zwemer）、毕敬士（Claude L. Pickens）等以及相关的重要文献，为这一课题提供了最基本的数据和线索。

整个90年代海内外的研究成果都比较少，但进入21世纪后，研究成果多了起来。其中日本学者松元真澄（Matsumoto Masumi）颇有建树。2004年她撰写了《基督教对中国穆斯林的宣教——文化帝国主义与伊斯兰教的觉醒》，^⑤分析了传教士对东方和伊斯兰教的偏见，他们在中国穆斯林地区各个阶段的传教活动及穆斯林对他们的回应。她指出来华传教士秉持西方文化中心和基督教优于伊斯兰教的逻辑，而这对于穆斯林大众毫无意义，因而基督新教对中国穆斯林布道的合法性是有问题的。2005年她又发表了《新教差会对中国穆斯林传教与穆斯林改革运动》。^⑥该文内容和结构框架与上文基本相同，但作者强调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伊斯兰改革运动与基督教的关系。她认为此时中国穆斯

① Raphael Israeli, "The Cross Battles the Crescent, One Century of Missionary Work among Chinese Muslims, 1850-1950",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29, No.1, 1995).

② Francoise Aubin, "L' Apostolat Protestant en Milieu Musulman Chinois", in *Chine et Europe: Evolution et Particularites des Rapports Est-Ouest Du XVIe ou XXe Siècle*, 1991.

③ Ralph R. Covell, *The Liberating Gospel in China: the China Faith among China's Minority Peoples*, Grand Rapid: Baker Book House Company, 1995, chapter 6 and 7.

④ 载《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

⑤ 载《首届赛典赤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⑥ Matsumoto Masumi, "Protestant Christian Missions to Muslims in China and Islamic Reformist Movement", *Annals of Japan Association for Middle East Studies* (Vol.21, No.1, 2005).

林知识分子的宗教、族群意识空前强化,积极接受现代观念和思想,对基督教传教士的宣教活动予以主动响应,从而推动了中国伊斯兰觉醒运动。松元真澄还发表了《现代中国伊斯兰与基督教的和睦相处——宗教对话中的胡籁明》。^①该文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胡籁明(Lyman Hoover)的活动为例,叙述了他与北平穆斯林的和睦相处,说明穆斯林学者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下,多持包容态度,参与宗教间的对话活动。作者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认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尽管传教士在中国穆斯林中进行了积极的传教活动,但最后皈依者不到40人,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传教活动完全失败,其传教工作也没有引起基督教世界的重视。松元真澄作为研究中国民族问题和伊斯兰教史的专家,在这几篇论文中都明显地表明其宗教多元的立场,因此对传教士向穆斯林传教给予毫不留情的批评。

2005年德国华裔学志研究所出版了《耶稣基督的中国面孔》系列丛书,其中第三卷(a)有两篇文章涉及到中国伊斯兰教中的耶稣形象。一篇是由澳大利亚学者李渡南(Donald Daniel Leslie)和中国学者杨大业合著的《中国伊斯兰教的耶稣先知》。^②该文摘译了《天方至圣实录》、《天方正学》、《天方大化历史》三书中有关耶稣的记录,结论是伊斯兰教文献中的耶稣虽然不同于基督教的耶稣,但穆斯林仍很尊敬耶稣,承认他是伊斯兰教伟大的先知。另一篇是由鄂法兰所著,其名为《在华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冲突中的耶稣》。^③该文认为新教传教士来华后发现伊斯兰教已经成为中国本土宗教的一部分,因此调整传教策略,包括传教士开始用伊斯兰教的习惯用语,如称“上帝”为“真主”,通过引进、编写及售卖阿拉伯文翻译的基督教读物(包括图片),向穆斯林宣教,重点在于阐述耶稣不仅是“无罪先知”,而且也是“真主之子”,进而宣扬基督教是最真、最完美的“真主的宗教”。

2009年美国《教会史》杂志发表了《一位在华的埃及人:阿赫麦德·法赫米与“世界基督教”的形成》,讲述了埃及穆斯林阿赫麦德(1861-1933)在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的影响下皈依了基督教,后去英国爱丁堡大学学医,加入伦敦会,到福建漳州传教,成为当地一位深受爱戴的名医。该文分析了他在埃及、英国和中国所面临的挑战,视他为那个时代“世界基督教”的一个典型范例。^④

近期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开始多了。上海师范大学王建平出版了两本书,详细介绍了哈佛燕京学社所藏的美国传教士毕敬士档案,^⑤披露了毕敬士所拍摄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多幅珍贵照片。^⑥南京大学华涛在2006年发表了《文明交往中的心态问题——民国时期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碰撞》,^⑦从穆斯林杂志《正道》1931年发表的传教士梅益盛与穆斯林学者关于“伊斯兰”涵义的激烈争论出发,讨论辩论双方的心态问题。他认为,相对于在公开场合传教士对穆斯林表现出来的尊敬态度,这里呈现了基督徒对待中国穆斯林的另外一种心态,即“宰制心态”。华中师范大学徐炳三利

① 载《“郑和下西洋与文明对话国际研讨会”论文汇编》,2005年。

② Donald Daniel Leslie and Yang Daye, “Jesus the Prophet in Chinese Islam”, in Roman Malek & Steyler Verlag ed., *The Chinese Face of Jesus Christ: Modern Faces of Jesus Christ*, Sankt Augustin: Institute Monumenta Serica and China Zentrum, 2005, pp. 847-867.

③ Françoise Aubin, “Jesus in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Islam and Christianity Transposed into China”, in Roman Malek & Steyler Verlag ed., *The Chinese Face of Jesus Christ: Modern Faces of Jesus Christ*, Sankt Augustin: Institute Monumenta Serica and China Zentrum, 2005, pp. 869-887.

④ Heather J. Sharkey, “An Egyptian in China: Ahmed Fahmy and the Making of ‘World Christianities’”, *Church History* (Vol.78, June 2009), pp. 309-326.

⑤ 王建平:《哈佛大学中国伊斯兰教数据拾遗》,《中国穆斯林》2005年第4、5、6、7、8期。

⑥ 王建平:《近代上海伊斯兰教文化存照——美国哈佛大学所藏相关资料及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近代陕甘宁青伊斯兰文化老照片——20世纪30年代美国传教士考察纪实》,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

⑦ 载《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第101-103页。

用《教务杂志》有关向穆斯林传教的丰富资料,对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穆斯林的研究、传教策略的形成以及传教实践进行了初步概述。^① 南京大学刘钦花在2007年完成了硕士论文《近代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回回穆斯林中的传教活动——基督教史料研究》。该文对基督教传教运动的背景、发起以及实施过程、失败原因等都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华中师范大学刘家峰根据《中国丛报》、《教务杂志》、传教士著作等资料,发表了《晚清传教士与中国穆斯林的相遇与对话》。^② 南京大学杨晓春的《略论晚清时期中国穆斯林学者对基督教的认识》,考察了晚清时期马德新、马联元、杨敬修等穆斯林学者关于基督教的评论,揭示了站在伊斯兰教立场上观察外教的基本思路。^③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马景、王建斌发表了《清末民初云南回族社会对基督教传播的认知与响应——马联元〈辨理明证语录〉及其影响》、《宗教对话中的马善亭阿訇》。^④ 香港教育学院何伟业的《知味默在中国——现代初期基督教与穆斯林相遇的探索》,指出知味默对当代伊斯兰教乃至基督教研究的重要性,尤其是他把中国伊斯兰重新带回世界舞台的意义。^⑤ 兰州大学刘继华的《知味默与基督教在华穆斯林传教事业——以知味默西北之行为为中心的探讨》,着墨于知味默1917和1933年两次来华考察的历史。^⑥

明末清初穆斯林知识分子与天主教传教士之间的交往论辩成为不少论文的主题。南京大学许淑杰的《明清时期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碰撞》^⑦ 对耶稣会士与回回天文学家在钦天监中的斗争做了分析。深圳大学问永宁的《试论王岱舆的“以回释儒”思想》^⑧ 认为王岱舆沿袭了利玛窦的一些学说,曼素尔·穆萨对此进行了批驳,发表了《实事求是,和谐敦睦——对问永宁先生的王岱舆沿袭利玛窦之说的回应》。^⑨ 云南大学姚继德发表了《从〈据理质证〉看马德新“回耶”对话观》,^⑩ 他根据穆斯林文献,在介绍云南穆斯林学者马德新与天主教云南教区法籍教士古若望交往活动的基础上,分析了马德新《据理质证》的内容,赞扬了马德新在对话中所体现出来的平等博大、和平共存的文化对话观。2009年姚继德发表了《清末中国回耶对话述评——云南个案研究》,其研究内容除了马德新与古若望的对话外,又添加了马德新高足马联元与内地会传教士冯德善的对话。作者认为这师徒二人的著作(《据理质证》与《辩理明正语录》)堪称“中国回教学术界与基督教学术界理论对话的经典著作”。作者亦分析了云南何以成为近代回耶对话的主要阵地,除了传教士在滇传教活动的刺激,更重要的原因是云南伊斯兰教学派素来注重回儒贯通、经书并授、学术研究与经堂教育并行。^⑪

有关基督教与穆斯林关系的研究还涉及新疆。该地传教组织主要是瑞典行道会和内地会。瑞典行道会(The Mission Covenant Church of Sweden, MCCS)传教从1892年开始,到1938年最后三名宣教士离开为止,他们在喀什葛尔、韩城、叶尔羌和英吉沙建立了教会。Rachel Wingate在《陡峭悬崖》

① 徐炳三:《从〈教务杂志〉看近代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穆斯林的传教活动》,《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

② 《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1期。

③ 载特木勒编:《多元族群与中西文化交流——基于中西文献的新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④ 分别载《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及《世界宗教文化》2009年第1期。

⑤ 载刘义章、黄玉明编:《不同而和: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对话与发展》,香港:建道神学院,2010年,第87-102页。

⑥ 载《边缘与多元:近代以来甘宁青地区的中西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兰州大学,2010年5月。

⑦ 载《文化对话与文化自觉——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

⑧ 载《文明对话-东方人文论坛》,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⑨ 载《儒化还是化儒——从伊斯兰文明看回儒对话》,新原书坊,2007年。

⑩ 载《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

⑪ 见载刘义章、黄玉明编:《不同而和: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对话与发展》,香港:建道神学院,2010年,第85-86页。

(*The Steep Ascent*) (1948?) 一书的序言中写道, 瑞典行道会的事工是“向穆斯林最成功的宣教”。^①由于数据源和语言问题, 此类研究主要由国外学者进行。较早的著作有瑞典学者John Hultvall在1981年完成的Mission och revolution i Centralasien。^②新疆社科院木拉提·黑尼亚提的博士论文《近现代新疆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研究》, 钱松的硕士论文《清末至民国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 也都有涉及。最新的著作是美国Linda K. Benson的《跨越中国戈壁》^③。该书研究了内地会三位女传教士盖群英(Mildred Cable)、冯贵珠(Evangeline F. French)、冯贵石(Francesca L. French)在西北的游历和布道, 我们由此了解到欧洲妇女在中国教会中的角色、甘肃及新疆的军阀政治以及西北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细节等。

二、研究前瞻: 视角与问题

以上综述可以看出, 由于研究者所受的学术训练、接触的材料、关注的问题不同, 其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也有所不同。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因为涉及到宗教、神学、民族、政治等问题, 具有复杂多样的面相, 因此, 多种视角的研究不仅需要, 而且也很有必要, 只有通过这类研究, 才有可能对此有全面深刻的认识。下面即对本课题研究的一些视角以及问题予以简要分析。

1, 传教与护教。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相遇中, 基督教一方一直处于主动和强势的地位, 而伊斯兰教处于相对被动, 但也做出积极的反应, 因此, 基督教的传教与伊斯兰教的护教就成为两者互动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有些问题在上述研究中有所涉及, 比如基督教的传教策略、传教士在穆斯林居住区的主要活动。但有些问题仍需要探讨, 比如, 同属基督宗教, 为何在华天主教没有明确地针对穆斯林地区传教的战略计划? 来华新教差会100多个, 为何独有内地会、瑞典行道会等少数几个差会对穆斯林传教情有独钟, 而其他差会比较冷漠? 对穆斯林的传教运动是如何组织化、系统化的? 这些问题还需要深入发掘。从伊斯兰教的护教方面来看, 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复初、马联元等少数几个知名人物。其实, 从清末到民国时期, 伴随着伊斯兰教育改革和海外留学生的增加, 一般穆斯林和阿訇的文化和经学水平都有所提高, 在护教方面已有很大改善, 他们针对基督教咄咄逼人的传教也曾做出有力响应, 引进翻译了不少阿拉伯世界针对基督教的护教著作。这方面值得挖掘的事实还有很多。最典型的案例就是1911年发生的所谓“回耶辨教事件”。这场风波以穆斯林大胜而结局。然而, 后期余波不断, 穆斯林学者又继续撰文批驳《回教考略》。到目前为止, 我们对这场争论的过程以及后续并不清楚。如何从伊斯兰教反应的视角看两教关系, 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④

2, 文明对话或宗教对话的视角。斯宾格勒、汤因比、道森等很早就讨论过世界各大宗教文明之间的关系, 但促成当前文明对话思潮的主要因素当属1993年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

“9·11”之后,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更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未必正确, 但影响巨大, 其表现之一就是促成了各种文明对话和宗教对话。文明对话的目的, 就中国儒家传统而言, 就是希望世界“和而不同”, 或如费孝通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

① 下载网址是http://www.answering-islam.org/Chinese/project/big5_topic21/18/big5_21_18_2.htm

② 斯德哥尔摩1981年版, 2004年修订版, 英文译本从网上可以下载, 网址是<http://www.missionskyrkan.se/Svenska-Missionskyrkan>。

③ Linda K. Benson, *Across China's Gobi, The Lives of Evangeline French, Mildred Cable, and Francesca French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Norwalk: Eastbridge, 2008.

④ 杨晓春已对此做了详细的考证, 见《〈回教考略〉与清末民初的回耶对话》, 曾在2010年6月南京大学举办的“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

同”。近代中国伊斯兰教的话语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如伊斯兰教报刊《醒回篇》中有“各是其是非其非,于不同之中而求同”的说法,《竹园白话报》也说“各信各教,各享自由,井水不犯河水,何苦无故的结怨为仇呢。”^①南京大学与哈佛大学从2002年开始组织的一系列“文明对话”会议,很注重从该视角对伊斯兰教与中国儒家思想的关系进行研究。这个方法同样也可以用来研究中国近代的回耶对话。在该视角下,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下列问题:近代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有没有文明对话的意识、心理和知识准备?有没有一种对话的机制?这种对话是偶然的还是有计划的?对话有无成果和影响?这些问题也可以加深我们对两个宗教关系的理解。

3,文化交涉学的视角。文化交涉学(cultural interaction,即“文化的互动”),是笔者借用关西大学托德民的提法。文化交涉学概念要比通常所讲的文化交流涵义更丰富,是文化交流研究的深化,它突破了以往以国家或民族为分析单位,“关注其内部所发生的有关文化的形成、传播、接触以及变迁现象,从综合性的立场出发,以多元化的视角对文化交涉的整体形态进行阐释”。^②文化交涉学的思路对于我们研究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特别有启发性。复旦大学葛兆光认为,“文化交涉即异文化间的彼此接触史,更可以说是各个文化的自我认识”。这两种宗教当然也是两种文化,两种文化背后又可细分为不同底色的文化,譬如以阿拉伯文化和波斯文化为底蕴的伊斯兰教,在传入中国1000多年的过程中,又与儒家思想为主的汉文化相融合,形成了有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文化。来华基督教代表了所谓“西方文明”,但它也不是一种纯色的文化,不但有基督教差会母国底色的差异,而且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在近代中国,这两种宗教文化其实都是与中国主流文化相疏离的弱势文化,而它们却又在强势的中国文化环境中相遇,两者之间如何接触、如何摩擦冲突,如何受主流文化约束,如何融合与变迁,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前面提到的文明对话和宗教对话视角,注重两种宗教的神学、哲学、伦理道德层面,而文化交涉的视角更注重这两种宗教文化相遇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动态的,不是固定的,也不是孤立的,是多种宗教文化因素在中国社会中的综合体现。

4,宗教运动全球化的视野。上述几种视角,并无高下优劣之分,不同视角所看到的问题会有所不同,彼此互相补充。但不论运用哪个视角来处理这个课题,都应特别注意放宽历史的视野,不可就中国而论中国,应该用全球史(或全球化)的观念和视野来处理这些丰富的议题。最早步入全球化进程的不是经济,而是宗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发展是最能体现宗教的全球化进程。由于西方在近代对中国的殖民侵略,中国也不再是一个孤立于世界的中国。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正是基督教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在华基督教向穆斯林传教也是西方基督教向全球穆斯林传教的一个环节。1906年新教各派传教士在开罗召开了第一次伊斯兰教世界传教士大会,开启了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向穆斯林的传教运动。1910年爱丁堡的世界传教大会又把向穆斯林世界传教列为福音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中国代表团(主要由来华传教士组成)在这次大会上提交了关于中国伊斯兰教情况的报告。这次大会对来华传教士的穆斯林传教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传教组织、策略以及人事方面。基督教向穆斯林传教的领袖人物知味默,他的女儿女婿(毕敬士夫妇)就是在华传教士向穆斯林传教的领袖。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穆斯林对基督教的回应也不纯然是中国的,而是和伊斯兰世界密切相关的。阿拉伯世界乃至英语世界中的护教作品,在20世纪源源不断地被翻译到中国来,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复兴也被伊斯兰传教士带到中国来,这些都影响到中国穆斯林有系统地对基督教做出反应。所有这些都说明,考察近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相遇绝不能忽略这个全球化的背景。

(责任编辑 段琦)

① 见马寿千:《马寿千回族史志论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7页。

② 具体见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研究中心网站, <http://www.icis.kansai-u.ac.jp/tw/institute.html#insti01>。